

□中国史研究

“辽”国号新解

姜维公 姜维东

〔摘要〕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界共识。据《辽史·地理志》的有关记载，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应与这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

〔关键词〕“辽”国号 “契丹”；箕子正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ZS011）

〔收稿日期〕2013-08-31

〔作者简介〕姜维公，长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兼图书馆馆长，教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姜维东，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长春 130032）

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界共识。笔者在研究《辽史·地理志》时发现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与这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舍弃《周书》以来契丹源于炎帝之说，确立契丹祖源于黄帝，从而将自己打造成为契丹族的“黄帝”，算是解决了民族起源问题。^{〔1〕}如果设想辽太祖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去世，则考虑其王朝的承继之由，必然要承接北魏之衣钵。^①因其舍东部鲜卑宇文氏之炎帝说，转而取北部鲜卑之黄帝说^②，固然出于托神改制的直接政治需求，也为宣扬王朝传承之由埋下了伏笔。辽太宗初期未有改易国号之举，直至破石晋后始改国号为“辽”，其逐鹿中原之意昭彰耳目。但耶律德光何以不踵其父足迹，取现成之“北魏名号”而转以陌生之“辽”为国号，则因其汉族智囊集团以为“元魏”亦不足以厌服汉人之心，故转而别

①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120-121页）谓拓跋魏之认黄帝为始祖，始于拓跋珪迁代之际，采纳汉族谋士崔宏之建议，则其攀认祖先之时机与用意，与耶律阿保机实有异曲同工之巧合。

② 《魏书》卷1《帝纪》：“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小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寻途径,以“辽”为国号,为契丹进取中原做“正统论”方面的铺垫;其后裔复以“契丹”为国号,此为契丹族保守派与汉族正统派斗争之结果,固无足论。至于辽道宗时复踵辽太宗故智,重改国号为“辽”,则是文化上颇为自信,自觉已能与南朝抗礼,宛如北魏与东晋之关系,故有改易国号之举。兹摭拾旧史,揭其隐覆,求教于方家。

一、辽国号研究综述

辽改易国号一事在《辽史》纪事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清代学者赵翼是通过《东都事略》^{[2]409-413}的相关纪事内容注意及此的^{[3]583},其后,在《陔余丛考》中也曾用“辽复号改号”一事来批评《通鉴纲目续编》体例的不当。^①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注意及此。^②但清代学者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现代辽金史学者而言,辽频繁改易国号的原因以及辽放弃习惯的“契丹”国号而改名“大辽”的意义何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呕心沥血破译的历史之谜,也因此产生许多种解释及假说,兹为叙述便利故,简介于下:

(一) 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研究

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挖掘,有两方面的研究重点,一是“辽”、“契丹”二号的本义;二是“辽”与“契丹”两国号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一般解“辽”为“辽水”,解“契丹”为“镔铁”。20世纪30年代,冯家昇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曾详细考绎“契丹”、“辽”两国号之蕴义,认为“契丹”可解为“镔铁”,乃民族之号“辽”则国号,得名于辽水。^③冯家昇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先行者,所做的工作又十分细致,因此,此说一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冯家昇的见解,如景爱就提出契丹与辽水的关系并不密切,辽朝统治者数度改易国号皆在本民族实力最强大时,故“辽国”一号,实得名于“辽远”之意。^{[4]35}笔者不认同景爱先生的“辽朝至少九改九复国号”的观点^{[4]37},也不认同其改国号为“辽”是“辽远”的意思,从而寓托了其疆域扩张之志^{[4]41}。关于契丹的族源地问题,学术界仍存在很大的分歧。^④但笔者认为景爱反驳冯家昇一派的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即“辽水在东丹国境内,不在辽朝的腹心地区,因此,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既不符合事实,又不合情理,是不能成立的”^{[4]41}。但无论是冯说的支持者,还是景爱等的新说,皆不足以惬人意,其以“辽”为国号的秘密仍未破解。尽管景爱等提出质疑,但传统观点仍以冯家昇、姚从吾等前辈提出的主张为正统,对于那些认同者而言,剩下的工作就是补充冯说之不足。冯说的支持者们认同冯家昇对辽国号的解释,认为辽与契丹的关系,正如元与蒙古的关系,前者是用于汉地,后者是用于全体契丹人。姚从吾、岛田正郎等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⑤,但共同的特征都是猜测的成分居多,立论的证据不足。所以,支

① 《陔余丛考》卷15《通鉴纲目》之“辽改号复号”条。

② 《廿二史考异》卷83“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

③ 原刊于《燕京学报》第13期,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

④ 传统的观点承自《魏书》和《辽史》,认为是最初在库莫奚之西,后在慕容鲜卑的打击下遁于“松漠之间”。现代学者之解释率立足于此,陈述《契丹政治史稿》认为契丹族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及《略谈对契丹社会性质的看法》一文、林幹《东胡早期历史初探》一文等均认为契丹族的族源地在“松漠之间”,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迁移,中心区域都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反对者也基本以立言为宗旨,多数是对传统观点做局部调整的面目出现,陈永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则提出契丹的族源地在辽泽一带。

⑤ 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原刊《大陆杂志》4卷4期,1952年2月;又见《姚从吾先生全集》第5集,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35页。岛田正郎《辽の北面中央官制の特色》,原载《法制史研究》第12号,1962年3月;又见同氏《辽朝官制の研究》,创文社(东京),1978年,第13-14页。

持者多从找证据弥补前说缺略为主,像刘浦江^[5]就把精力放在辽朝国号的改易上,他仔细考察辽代文献中汉语“辽”与契丹语“辽”的内涵,强调辽“双国号制”的意义。刘凤翥也在一篇论文中强调辽朝双国号的意义。^[6]像佟家江、刘凤翥两位都曾主张契丹是改“晋”为“大辽”,而非改“契丹”为“大辽”。^[7-8]尽管他们都认识到了此次改易国号与汉族有密切关系,但斤斤于辽太宗破晋改号的相关记载,遂得出如上结论。

(二) 关于契丹首改国号的时间问题

关于契丹首次改国号为“辽”的时间,一般有 937、938 和 947 年三种说法。937 年之说的支持者是尚铖。^① 938 年之说的支持者是陈述。^② 947 年的支持者众多,陈垣《廿二史劄记》就定契丹于 947 年改元。其后,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③、翦伯赞《中国史纲要》^④、张正明《契丹史略》^⑤、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⑥、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⑦等均如是说。

937 年是辽太宗延续其父天显年号的最后一年,也是辽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年,故尚铖认为耶律德光获得建立正统政权的资格,于是年改国号。938 年,耶律德光改年号会同,蕴有四海一家之义,故《东都事略》纪其事时称有改元改国号之举,《契丹国志》从之。至于 947 年,则是辽太宗灭晋之时,《辽史》诸书记载其时有改元改国号之举。笔者的倾向也是 947 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辽未能颠覆任何一个中原政权,仅取中原数州之地,尚不足认为其有染指中原正统之资格。而灭晋后,完全可以“承晋”之后建立一个正统政权。

(三) 辽改国号次数研究

关于辽改国号的次数,一般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见解,即辽太宗时改国号为辽,辽圣宗时复号契丹,至辽道宗时复改国号为辽。^{[7]25}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景爱就认为辽曾九改九复国号,也就是说,辽曾改国号达 18 次之多。^{[4]36}刘浦江也曾对此做过统计,但契丹、大辽在金石文字中交叉出现是因为民间对国号的使用较为随便所致。笔者将涉及辽朝国号变化的碑记做了比对,发现景爱之说过于偏颇,倒是叶昌炽所说的“间有不书‘大辽’,书‘大契丹’者,犹之拓跋氏代魏兼书,示不忘本之义也”近于平实。^⑧作为崛起于朔漠的北方政权,北魏、金、元都曾在族源与王朝承接上反复争论,像传世的《大金德礼》就是这种争论的产物;元代直至末季才修成辽、金、宋三史,延误的原因也是因为这种争议长期无法止息。那么,辽建立封建王朝时也少不了这种争议,与完颜金一样,这种争议都源于智囊团汉族知识分子意见的分歧。由于当代学者都没有认识到辽朝曾炮制“箕子道统”的事实,不了解辽朝树立自己正统观的根源,当然也无法了解辽朝改名“大辽”的真实意图。

二、辽国号的改易

《辽史》中没有多少涉及改易国号的纪事,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及“辽史疏漏处”曾引《东都事略》说“《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

① 尚铖《中国历史纲要》:契丹取得十六州,937 年改国号为辽。

②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认为,契丹于 938 年改称辽国。

③ 《中国通史》第六册辽代部分说:会同十年(947)二月,建国号大辽,改年号大同。

④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说:公元 947 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

⑤ 张正明《契丹史略》:947 年,辽太宗入大梁后,改号大辽。改元大同,有久据中原之意。

⑥ 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说“公元 947 年二月,耶律德光进军开封,晋亡。耶律德光改国号大辽。”

⑦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说,947 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

⑧ 叶昌炽《语石》卷 1“辽金五则”条。

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3]583}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据《辽史》记载，是在公元907年，《辽史》无建国号、年号之举，只有群臣上尊号之事。^①辽太祖之建年号在公元916年，是年，亦因群臣上尊号，而改元大赦，年号为神册。^②其后复有改元天赞（922年）、天显（926年）之举，然无涉于国号。盖自唐以来习惯以契丹为族号，草创之初，诸事简易，因而建国后未考虑国号问题，观《辽史》神册五年有“制契丹大字”记载，益可证其时以“契丹”或“大契丹”为国号。辽太宗即位之初，亦无建国号之举，且仍沿用辽太祖的“天显”年号，尤可证其时“诸事简易”之实情。至破晋之后，始更易国号为“大辽”。由于改国号与灭石晋在时间上有密切的联系，且新年号名为“大同”，这一切让人不得不做政治上的联想与解读，认为辽太宗改国号实际反映的是其逐鹿中原、一统四海的野心。事实上，学者们的研究也都是在做政治上的联想与解读，不过角度不同，结论各异而已。

契丹马上立国，初无文字。耶律阿保机之兴，其智囊团皆由汉族知识分子组成，故典章制度多仿效唐制，定国号事关政权的正统性，自非契丹耶律氏所能为，必有汉族士大夫为之谋主。唯耶律阿保机并未完成破晋的历史使命，也就没有取得正统的资格，直到其子耶律德光时始完成此举，获得燕云十六州，并可以“承晋”的方式获得中央王朝的正统。正因为辽以两代之力始获得此逐鹿中原之资格，则二者之间实现建立正统政权的思想并不一致。从辽太祖时将族源由传统的炎帝改为黄帝，则可知耶律阿保机想采取的是北魏拓跋氏的旧伎，其国号最有可能是“魏”。唯太祖驾崩于扶余府，述律后发动“扶余之变”，改变了辽太祖生前确定的帝位传承方式，拥护太祖政策的重臣将领多数被屠戮。以政策而言，太祖之政策主要由其智囊团决定，而其智囊团的核心人物分别为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与王郁，其中韩知古、康默记皆卒于天显中，死因不明，疑与诸将同罹扶余之祸。而述律后对韩延徽有救命之恩^③，王郁在太祖去世后对述律后有效忠之举^④，故得以幸免。则二人虽免于死，且得预新帝之政策，但太祖智囊团的崩溃，势必导致辽太祖的政治理念也无从传承下去，不唯皇太子耶律倍流亡他乡，仿效北魏建立中央封建政权的主张也一并付诸流水。

947年正月，正是耶律德光破晋完胜之时，遂有改国号“大辽”，改年号“大同”之举。其代晋自承之意至为明显。唯何以改国号为“大辽”，众说纷纭，迄未得一正解。盖其时倚重之汉将如赵延寿、杜重威辈，耶律德光皆虚与委蛇，使之抱有统治南土之希望而赴死如归；其所委任之文士如都承旨张浩辈亦皆有以“南人治南土”之政治理念，而不拟推耶律德光为天下共主。至于出身契丹族之将士，其时率以剽掠自资，殊无政治之远见。以述律后之精明练达，亦无久留汉土之意，则其下者可想而知。然则为耶律德光策划者，则别有其人。唯史书阙略，史家稽考不

① 《辽史》卷1《太祖纪上》：“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汪王集会处，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刺、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

② 《辽史》卷1《太祖纪上》：“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董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初，闕地为坛，得金铃，因名其地曰金铃冈，坛侧满林曰册圣林。”

③ 《辽史》卷74《韩延徽传》：“后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谏曰‘彼秉节弗挠，贤者也，奈何困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资治通鉴》卷269“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马于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④ 《辽史》卷75《王郁传》：“太祖崩，郁与妻会葬，其妻泣诉于淳钦皇后，求归乡国，许之。郁奏曰‘臣本唐主之婿，主已被弑，此行夫妻岂能相保。愿常侍太后。’后喜曰‘汉人中，惟王郎最忠孝。’以太祖尝与李克用约为兄弟故也。寻加政事令。还宜州，卒。”

足,遂多望文生义之见。至辽圣宗立,时值童幼,母后柄政,即位之初即改国号“大契丹”,显出萧燕燕之意。后遂举兵南向,与宋结“澶渊之盟”,南北鼎立之势固化。然与宋叙兄弟之谊,仍效法于笼络石晋之意,至于正统之争,似非当时所尚。至辽道宗时,其为辽诸帝中文化水平最高之一人,不唯熟悉儒家,兼工汉文诗词,且于释道两途,亦无碍滞,至有亲制经论,赐碑外国之举。故其复改国号为“大辽”,实因文化上获得自信的结果。从众多辽代墓志中在契丹或辽的国号前都有“大中央”或“南瞻部洲”的字样来看,到辽道宗时,已经俨然以中国自居了。

表 1 辽国号改易年表

序	辽帝	时间	国号	改易与具体内容	出处
1	太祖	神册元年(916)	契丹		辽史、契丹国志
			辽	天福三年 改元会同 国号	东都事略
2	太宗	会同元年(938)	大辽	改元会同 国号大辽	契丹国志
3	太宗	会同四年(941)	契丹	志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羽之墓志(续)
4	太宗	大同元年(947)	辽	建国大辽 改元大同	辽史
5	世宗	天禄三年(949)	辽	正文有“大辽皇帝”字样	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据《析津日记》载,此碑后列有“大辽皇帝”等字样(编)
6	穆宗	应历五年(955)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陈万墓志(编)
7	穆宗	应历五年(955)	辽	墓志有“大辽间”字样	刘存规墓志(编)
8	穆宗	应历八年(958)	辽	题额有“辽”字,文中有“大辽嗣圣皇帝”字样	赵德钧妻种氏墓志。此文殊不可解,后有统和年间后人刻字,疑其时改镌(编)
9	穆宗	应历十年(960)	辽	正文有“大辽应历二年”、“大辽应历十年”字样	三盆山崇圣院碑记(编)
10	穆宗	应历十六年(966)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李崇菀为父彦超造陀罗尼经幢记(编)
11	景宗	保宁元年(969)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重移陀罗尼经幢记(编)
12	景宗	保宁二年(970)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①	刘承嗣墓志(编)
13	景宗	保宁二年(970)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字样。文中有“契丹国”及“上国之言与中华迥异、万方入贡、中夏来朝”之句	耿崇美墓志(续)
14	景宗	保宁十年(978)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李内贞墓志(编)
15	景宗	保宁间	辽	题额有“辽故”字样	吴景询墓志(续)
16	景宗	保宁十一年(979)	契丹	题额、正文中均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琮墓志(续)
17	景宗	乾亨元年(979)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王裕墓志(编)
18	景宗	乾亨三年(981)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陈公之铭(编)

^① 向南注谓:按,辽太祖建国初称契丹,太宗大同元年建号大辽。圣宗统和元年又改号契丹。本志撰于保宁二年,似不应称契丹。

19	景宗	乾亨四年(982)	契丹	题额有“□契丹国”字样	许从赟墓志(续)
			契丹	梁王隆绪立,年十二,自称天	东都事略
				辅皇帝,尊母燕燕为承天皇太	
20	圣宗	统和元年(983)		后,改大辽为大契丹国。	
				统和元年,帝即位,复号大	契丹国志
				契丹	
21	圣宗	统和二年(984)	契丹	文中有“大契丹国”字样	朝阳南塔定光佛舍利铭 记(续)
22	圣宗	统和四年(986)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延宁墓志(编)
23	圣宗	统和十五年(997)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韩佚墓志(编)
24	圣宗	统和十八年(1000)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高嵩墓志(续)
25	圣宗	统和二十年(1002)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平州赵府君墓志(编)
26	圣宗	统和二十二年(1004)	契丹		契丹国志
27	圣宗	统和二十三年(1005)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徒都太尉夫人墓志(续)
28	圣宗	统和二十六年(1008)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元宁墓志(续)
29	圣宗	统和二十七年(1009)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萧氏夫人墓志(续)
30	圣宗	统和二十八年(1010)	契丹	纪时有“大契丹国统和廿八 年”字样	许延密建尊胜陀罗尼经 幢记(续)
31	圣宗	统和二十九年(1011)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隆祐墓志(续)
32	圣宗	统和二十九年(1011)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王氏墓志(编)
33	圣宗	开泰九年(1020)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耿延毅墓志(编)
34	圣宗	太平二年(1022)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韩绍娣墓志(续)
35	圣宗	太平七年(1027)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遂正墓志(续)
36	圣宗	太平七年(1027)	辽	题记中有“辽”字样	房山石经题记(编)
37	兴宗	重熙四年(1035)	契丹	正文有“南瞻部州、大契丹国” 字样	张哥墓志(编)
38	兴宗	重熙六年(1037)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遂忠墓志(续)
39	兴宗	重熙九年(1040)	契丹	正文有“大契丹国”字样	吕思支墓志(续)
40	兴宗	重熙十二年(1043)	契丹	正文有“大契丹”字样	朝阳北塔今聊记石匣内 题记(续)
41	兴宗	重熙十三年(1044)	契丹	正文有“南瞻部州、大契丹国” 字样	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 塔石函记(续)
42	兴宗	重熙十三年(1044)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 (续)
43	兴宗	重熙十四年(1045)	契丹	文中有“南瞻部州大契丹国辽 东沈州”字样	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舍 利塔石棺记(续)
44	兴宗	重熙十八年(1049)	契丹	文首有“南阎浮提大契丹国章 圣皇太后特建”字样	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 碑(续)
45	兴宗	重熙二十二年(1053)	契丹	志盖上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宗教墓志
46	道宗	清宁三年(1057)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丁求谨墓志(续)
47	道宗	清宁四年(1058)	契丹	文中有“大契丹”字样	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 续镌成四大部经记(编)

48	道宗	咸雍二年(1066)	辽		东都事略、契丹国志
49	道宗	咸雍二年(1066)	辽	文中有“大辽国”字样	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续)
50	道宗	咸雍四年(1068)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萧知行墓志(续)
51	道宗	咸雍五年(1069)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萧闳妻耶律骨欲迷已墓志(续)
52	道宗	咸雍六年(1070)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陈凯妻曹氏墓志(续)
53	道宗	咸雍七年(1071)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萧闳墓志(续)
54	道宗	咸雍七年(1071)	辽	正文有“大辽嗣圣皇帝”字样	弘农杨公墓志(续)
55	道宗	咸雍八年(1072)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耶律宗愿墓志(编)
56	道宗	咸雍九年(1073)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萧德恭墓志(续)
57	道宗	大康二年(1076)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记(续)
58	道宗	大康二年(1076)	辽	文中纪时有“大辽”字样	王敦裕墓志(续)
59	道宗	大康二年(1076)	皇辽	文中有“皇辽受命”之辞	仁懿皇后哀册(全)
60	道宗	大康四年(1078)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续)
61	道宗	大康七年(1081)	辽	题额有“北朝大辽国”字样	萧孝恭墓志(续)
62	道宗	大康八年(1082)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萧勃特本墓志(编)
63	道宗	大康九年(1083)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正文有“皇辽”字样	耶律元佐墓志(续)
64	道宗	大安元年(1085)	辽	题额有“辽国”、正文有“大辽文成皇帝”字样	郑颀墓志(续)
65	道宗	大安二年(1086)	辽	题额有“大辽国”字样	蓟州渔阳县好女塔院特建碑铭(续)
66	道宗	大安三年(1087)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刘楷等建陀罗尼经幢记(续)
67	道宗	大安三年(1087)	辽	题额有“大辽皇弟”字样	耶律弘世墓志(续)
68	道宗	大安五年(1089)	辽	刻文有“大辽国”字样	阜新三塔沟石函记(续)
69	道宗	大安六年(1090)	辽	题额、正文有“大辽”字样	芹城邑众再建舍利塔记(续) 经幢记(续)
70	道宗	大安七年(1091)	辽	正文有“大辽国”字样	萧乌卢本娘子墓志(续)
71	道宗	大安九年(1093)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张匡正墓志(续)
72	道宗	大安九年(1093)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张文藻墓志(续)
73	道宗	大安九年(1093)	辽	文中纪时有“大辽”字样	琬公大师塔铭(续)
74	道宗	大安九年(1093)	辽	文中有“皇辽”字样	萧公妻耶律氏墓志(续)
75	道宗	大安十年(1094)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耶律智先墓志(续)
76	道宗	寿昌元年(1095)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永清公主墓志(续)
77	道宗	寿昌二年(1096)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耶律弘世妻秦越国妃墓志(续)
78	道宗	寿昌二年(1096)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显密圆通建舍利塔记(续)

79	天祚帝	乾统五年(1105)	辽	题额有“大辽”、正文有“皇辽”字样	刘文用墓志(续)
80	天祚帝	乾统五年(1105)	辽	题额有“皇辽”字样	刘贡墓志(续)
81	天祚帝	乾统七年(1107)	辽	正文有“大辽国”字样	沙门可炬幢记(续)
82	天祚帝	乾统七年(1107)	辽	正文有“沈州南瞻部州大辽国”字样	沈阳崇寿寺塔地宫石函记(续)
83	天祚帝	乾统八年(1108)	契丹	正文出现了“契丹令史”一职	蔡志顺墓志(续)
84	天祚帝	乾统九年(1109)	辽	正文有“大辽国”字样	李从善幢记(续)
85	天祚帝	乾统九年(1109)	辽	题额有“辽”字样	唐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记(续)
86	天祚帝	乾统九年(1109)	辽	题额有“大辽国”字样	萧孝资墓志(续)
87	天祚帝	乾统九年(1109)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妃萧氏墓志(续)
88	天祚帝	乾统九年(1109)	辽	正文四见“大辽”字样	房山天开塔舍利石函记(续)
89	天祚帝	乾统十年(1110)	辽	志盖上有“大辽国”字样	萧德恭妻耶律氏墓志(续)
90	天祚帝	天庆元年(1111)	辽	正文有“皇辽”字样	丁洪墓志(全)
91	天祚帝	天庆三年(1113)	皇辽	正文有“皇辽”字样	丁文育墓志(编)
92	天祚帝	天庆七年(1117)	辽	题额、正文均有“大辽”字样	石经寺释迦佛舍利塔记(续)
93	天祚帝	天庆七年(1117)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孟初墓志(续)
94	天祚帝	天庆八年(1118)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经幢记(续)
95	天祚帝	天庆九年(1119)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天王寺建舍利塔记(续)
96	天祚帝	天庆十年(1120)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郭仁孝为父母建顶幢记(续)
97	天祚帝	保大元年(1121)	辽	题额有“大辽国”字样	刘玮墓志(续)

注：另有多方无法判定时代的金石文字，虽有“辽”、“契丹”、“皇辽”等字样，兹略。

三、辽太祖改宗黄帝与辽太宗改国号之关系

关于王朝（国号）取名之蕴意，陈学霖曾总结为六点：1）有因封号以为名者；2）有因治地以为名者；3）有稽之姓系以为名者；4）有托之前代以为名者；5）有夸其权力以为名者；6）沿袭宗教迷信以为名者。^{[9]2}

自宇文氏以来，契丹族确立了以炎帝为祖源的传统；至辽太祖时，则改宗黄帝。耶律阿保机以部族军事长官成为本族可汗，进而成为皇帝。而在此称帝建国进程中，由于违背了传统的“世选制”，不但遇到契丹八部的阻碍，也遭到辽太祖本部迭刺部的反对，斗争的结果虽然是辽太祖全面获胜，但对契丹而言，生产力却受到很大破坏。辽太祖采纳汉族臣僚的建议，发起一场造神运动，不但树立黄帝为契丹族祖宗，也把自己打造成契丹族的现代黄帝。这个造神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我们从史籍或辽代碑志看到辽宗室的爵位中都有“漆水”字样，如“漆水郡公”、“漆水郡王”等，即取自黄帝起于漆水之意。至于后族统一改姓萧氏，又与辽太祖

自比刘邦,以“萧何”喻后族,后族爵位中恒有“兰陵”字样,即以萧氏郡望为爵号之名有关。需要说明的是,宇文氏与拓跋氏虽皆为鲜卑族,但在族源认定上并不相同。宇文氏以“炎帝”为祖,拓跋氏却以“黄帝”为祖,身为宇文氏后裔的辽太祖改认黄帝为祖,不唯是出于造神运动之需要,也有仿效拓跋氏进军中原、跻身中原政权之意,故其心中之正统国号非“魏”莫属。而辽太宗破晋之后,则以“辽”为国号,显然是以“辽水”为植根之地^①,这一点颇出人意料,亦遭后人质疑。盖辽水非契丹故乡,在此之前为渤海所有,辽太祖去世前始征服渤海,将今辽东地区收入版图。那么,辽太宗以“辽”为国号,是出于何种正统承接理念呢?笔者认为,是箕子正统理念。

在《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的相关记载中,人为地将古代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集中在辽阳,而这种人为的篡改是出自辽朝本意,并非是元人修志的结果。而辽朝这样篡改历史,实际是想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传承表来。予尝撰文论之^[10],兹概述其意如下:

在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君子国”、“东夷”、“箕子”三个名词相联系的传统。殷商之末,箕子东迁朝鲜,教化一方,遂使箕子朝鲜成为此君子国之代表。其后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分别继承了这份历史文化遗产,都以箕子的继承者自居,也都被中原王朝视为海东君子国。箕子国的特征正是《汉书·地理志》中所描述的八条之教、礼义、田蚕、织作、妇人贞信、饮食以菹豆等^②,这种来自传统史书的肯定完全是作者站在中原的角度来考虑的,是一个农业文明对另一个农业文明的欣赏。

契丹是我国古代东胡族系的一个游牧民族,曾一度臣附于高句丽。这期间,契丹族懂得获得“君子国”的声誉对成为东北地区霸主的重要性,所以,契丹建国后,也加入到争夺“箕子国继承者”的行列中来。契丹却不屑于以高句丽的继承者身份来承接“君子国”的名号,因为臣附高句丽的那段历史并非契丹族的荣光,以此来与箕子朝鲜攀附未免尴尬。故而,契丹另辟捷径,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承继表来,强调其继承箕子朝鲜之理由是以辽东地区的政权承接,契丹灭掉渤海,从渤海国手里得到箕子故壤,以此获得君子国的身份。

《辽史·地理志》记载了这份独一无二的箕子历史遗产传承表:

东京辽阳府,本朝鲜之地。周武王释箕子囚,去之朝鲜,因以封之。作八条之教,尚礼义,富农桑,外户不闭,人不为盗。传四十余世。燕属真番、朝鲜,始置吏、筑障。秦属辽东外徼。汉初,燕人满王故空地。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后汉出入青、幽二州,辽东、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汉末为公孙度所据,传子康、孙渊,自称燕王,建元绍汉,魏灭之。晋陷高丽,后归慕容垂;子宝,以勾丽王安为平州牧居之。元魏太武遣使至其所居平壤城,辽东京本此。唐高宗平高丽,于此置安东都护府;后为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娄之东牟山。武后万岁通天中,为契丹尽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辽水自固,武后封为震国公。传子祚荣,建都邑,自称震王,并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中宗赐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彝震,僭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号中京显德府。太祖建国,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湮曷,以为东丹王国,立太子图欲为人皇王以主之。神册四年,葺辽阳故城,以渤海、汉户建东平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引张汇《节要》称“辽以辽水名国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也说“辽人以辽水名国也。”

② 《资治通鉴》卷21亦曾总结说“昔箕子居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为民设禁八条。”

郡，为防御州。天显三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①

由上可以看出，契丹方面列出的继承表是箕子朝鲜→卫氏朝鲜→公孙氏政权→慕容氏政权→渤海政权→东丹国→大辽。这个继承表有很大的勉强成分，为了增加说服力，人为将箕子朝鲜、公孙氏政权、慕容氏政权、高句丽、渤海的统治中心都说成是辽阳。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箕子朝鲜、高句丽公认的首都在平壤，渤海的初期首都在今吉林省敦化市；后期首都忽汗州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的渤海镇，可以说渤海五京，没有一京是在辽阳。除了公孙氏政权外，其他几个政权的统治中心都不在辽东京辽阳府。为了将这几个政权的统治中心迁移到辽东京辽阳府，辽代的史学家已经开始着手篡改历史，因而出现了乐浪郡首府、高句丽首都、渤海首都都在辽阳，辽东郡治所反而迁出辽阳的笑话，至于将《新唐书·渤海传》的“海东盛国”改为“辽东盛国”等涂抹更不足为奇。在辽人的墓志中也有这样的纪事内容，充分反映出此种宣传之深之广，如《萧袍鲁墓志》记载“国家以殷子古墟，鲜卑别部，风俗桀骜，镇抚实难，式籍沉谋，俾遏乱略，命公为汤河女直详稳”^②。

《墓志》中的“殷子古墟”一语颇耐人寻味，虽然《辽史·地理志》称辽阳为箕子故国，但辽代王郁家族有先攀附箕子、后攀附微子的事例，而微子是当时公认的辽后族的祖先。所以，“殷子”之辞颇有内涵，这里不妨仍当“箕子”解。

当然，中原王朝肯定朝鲜、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箕子国继承者身份，是因为其有鲜明的农业文明特征，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建国后其主要经济基础也依然是畜牧业，当然无法获得北宋与王氏高丽的认可。可见，尽管契丹想以“箕子国继承者”的身份自居，但它既与北宋为敌国，复位在正北，不易为宋所承认。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君子国正统地位都是由宗主国承认而获得的，而宋、高丽同时视契丹为北狄禽兽之国，不承认其有“箕子余风”，使其无从获得“君子国”的美誉。当然，契丹也未曾设想如何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能为中原王朝——当时的北宋政权——承认的君子国。契丹之所以强烈要求成为箕子继承者，是有其政治企求的。

契丹企图获得“君子国”名号的初衷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标榜自己，退可以使之成为自己作为一方霸主的冠冕，进可以逐鹿中原，一统河山；一方面则是出于领土上的企图，在攻打王氏高丽时就公然以此为由，要求王氏高丽割让平壤以北地区。^[10]

如果我们把目光收回到辽太宗改国号的时机，也就是破晋之时，就会认识到改国号为“大辽”不是针对王氏高丽的，也不是以取得东丹国地区而得名，而是针对汉人区域的一种举措，实际上是以汉人正统自居。换言之，契丹实际上是以殷商的继承人自居，展示的是自己逐鹿中原的抱负。从辽太宗“会同”、“大同”的年号上也可以窥见此点，“会同”、“大同”都有一统江山、万国宾服的“天下大同”意味。从这一点来看，学者们认为辽朝改易国号与其“一国两制”密切相关的见解是正确的，但都没有真正认识原因而强作解人。因为河北也曾是殷人故壤^③，其以箕子继承人的身份是有资格居于此的。正如《萧旻墓志》所称“圣元皇帝吞二辽以建极，孝武皇帝降三晋以来庭。”^{[11]113}

① 《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东京道条下。

② 《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下》之《萧袍鲁墓志》。汤河在辽阳地区，《辽史·百官志》辽阳路诸司有“汤河详稳司，亦曰南女直汤河司”。可见此金石文字正与《辽史·地理志·东京道》所载箕子朝鲜事相契合。

③ 《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巨鹿郡，秦置。属冀州。户十五万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七。县二十：巨鹿，《禹贡》大陆泽在北。紂所作沙丘台在东北七十里。”又《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紂淫乱余民。”

四、契丹改名“大辽”的谋主

我们知道,辽太祖、辽太宗、辽世宗身边有一大批汉人谋主,为其建国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使契丹从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王国。从史书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推知,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王郁是辽太祖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韩延徽、王郁是辽太宗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高勋则为辽世宗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如史籍称韩延徽佐助辽太祖之功勋云:

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12]8810}

这些汉族谋臣各有建树,为契丹族迅速建立封建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在契丹改国号一事,是出自哪个谋臣?笔者认为,是王郁父子。

首先,王郁父子具有作为谋主的身份。

炮制箕子道统表,使契丹获得逐鹿中原的资格,这种事是文化上较为落后的契丹人做不来的,只能是其汉人智囊集团的杰作。辽太祖去世后,韩知古、康默记大概皆为述律后所诛杀,只有韩延徽与王郁仍在辽太宗麾下效劳。笔者从墓志上了解到,在改易国号上王郁父子是实际上的谋主,其策略不但谋国,也有谋身的意味在内。

王郁,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之子,也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女婿。王处存为解除成德节度使赵文礼给自己带来的威胁,让王郁投奔契丹,引导契丹南下。^①当然,这次契丹南下没有遂心如意,史称王郁自此在契丹失势,已经丧失了谋主的资格。^②但这种说法是立不住脚的。我们知道王郁仍是辽太祖之养子,且在辽太祖不受代一事上仍有进谏之事^③,在辽太祖征服渤海的过程中立了大功^④,在辽太祖死后又获得述律后的青睐,《王裕墓志》中也称其为“两朝贵宠”^{[13]62},所以,在炮制箕子道统表上王郁作为智囊之一仍是有资格的。《辽史》及王郁子孙墓志中所载王郁官职颇不一致,据向南所考,王郁在辽历官次第为:

初授义武军节度使,改授崇义军节度使,进授明殿左相,终任龙化州节度使。王郁为龙化州节度使时间,《太宗纪》:天显三年正月“庚午,以王郁为兴国军节度使。”又谓王郁子王庭鹞云“王鹞,应即是王庭鹞。《太宗纪》:天显十年五月‘癸丑,以舍利王庭鹞为龙化州节度。’据《王郁传》载‘太祖崩,寻加政事令,还宜州,卒。’从《太宗纪》:天显三年正月‘庚午,以王郁为兴国军节度使(按:兴国军为龙化州军号)、中书令(笔者补)。’五年三月‘壬午,以龙化州节度使刘居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王郁还宜州在五年三月之前,其卒年则在五年之后,此恰与王庭鹞为龙化州节度使时间

① 《辽史》卷2《太祖纪下》:“神册六年冬十月癸丑朔,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丙子,上率大军入居庸关。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众来朝,上呼郁为子,赏赉甚厚,而徙其众于潢水之南。”

② 见《资治通鉴》与《契丹国志》。《契丹国志》盖取材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271“契丹主责王郁,縶之以归,以王郁误之入寇也。自是不听其谋。”

③ 赵志忠《虢廷杂记》:“有韩知古、韩颖、康枚、王奏事共劝太祖不受代。”此四人《辽史》均为立传,因文字原因,需要说明的是韩颖即韩延徽,此有墓志可证。康枚,即康默记之脱误,辽代墓志中称之为“康梅棘”,王奏事,即王郁,“奏事”为“政事令”之讹。

④ 《辽史》卷2《太祖纪下》:“天显元年二月庚寅,安边、郑颢、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慰劳遣之。以所获器币诸物赐将士。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显。以平渤海遣使报唐。甲午,复幸忽汗城,阅府库物,赐从臣有差。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

相合，且知王庭鶚为龙化州节度乃仿中原制度子袭父职。又王氏在唐为强宗大族，其子孙名字均甚讲究。处存、处直，中间皆有一‘处’字。处存子部、邺，处直子都、郁，其名部首皆从‘邑’。据《王悦墓志》记，王郁尚有一子名庭阮。《旧五代史·王庭胤传》记，王邺有一子名庭胤。其中间均有一‘庭’或‘廷’字。庭、廷古通用、实为一字。此等命名正与中原汉族习惯相合，故可断定王裕之父当是王庭鶚，志作单字鶚，实夺一‘庭’字。”^{[13]65}

当然，王郁是作为太祖时旧臣留用的，辽太宗身边也有一群汉族文臣武将簇拥着，但从各人表现来看，都不是此次谋划之谋主。赵延寿在平晋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之所以如此拼命，是因为辽太宗许诺平晋后立其为南人之主，如辽之立石敬瑭。杜重威拥兵之降，亦因辽太宗有相同的承诺，但辽太宗后来都失信了，导致杜重威郁郁而终，赵延寿在辽太宗去世后即阴谋自立，旋为辽世宗所囚^①。武将中之赵思温亦力战有功^②，然破晋后旋与赵延寿安置于中京，可见耶律德光对其人的防范。至于辽太宗身边的汉族谋臣，亦颇有主张册立汉人王汉地者，如王郁。

其次，王郁父子具备炮制箕子道统表的条件。如下事实也表明王郁可以炮制出箕子道统表来。

(1) 比干墓在定州，唐太宗亲征高丽时曾祭祀过他。这是义武军节度使的地盘，经过王郁家族长期（王处存、王处直、王郁、王都）盘踞，此中风物，当为王郁父子所熟知。

(2) 王郁之祖先是京兆万年人，出身商贾，本非望族，系因巴结宦官而成为一方诸侯。王氏之先祖，或推溯于王子晋（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皆是）^③，或推溯于秦将王翦。王郁家族作为一个暴发户，攀附到哪一个祖先都不足为异。但在入辽后的王郁后代墓志中，却都将祖先与殷商联系起来。如王郁之孙王悦的墓志中述其祖源时称“殷王子比干，为纣所害，子孙以王者之后，因而称氏。”^{[13]112}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比干墓在定州而做的攀附，盖王悦之先世，最初只能追溯到王宗，王宗是以军校巴结宦官而逐渐显达的，显非名宗贵族。笔者进而推断，这种攀附是在王郁炮制出箕子道统表后做出的，因为内地王姓子弟发达后，非攀附太原即攀附琅琊，甚少与殷商攀附的事例。正因这种攀附，辽地王姓人家多有从其说者。如《韩绍娣墓志》云：

公本姓王氏，讳绍娣，字仁保，檀州琅耶人也。其先出自王子比干，当纣末之子孙避难于河东，以王者之裔乃命氏焉。高曾祖三世，早坠洪勋，无能备说。昔遭离乱，今致漂流。星散燕南，蓬飞蓟北。因偶妻于韩氏，遂依托于刘公。古琅耶今昌黎，虽上下之郡名各异，奈五音之姓利攸同。^{[11]63}

尤为奇怪的是，这种攀附如果和“辽”国号直接相联系，则子孙宜长相保有此说以固幸邀宠。但是，在王郁后代的墓志中这种姓氏由来还另有衍变。如在王郁另一个孙子王裕墓志中，则将祖先转移到与箕子、比干共列为殷商三仁的“微子”身上“公讳裕，字伏贞，本素有殷之苗裔。姬周授命封微子为王，遂因以命氏焉”^{[13]6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呢？笔者认为，这种转变是王氏家族讨好后族的一种手法。因为辽代后族都以萧何后代自居，而萧何一族则是宋的支子衍变而来，而宋的祖先正是微子。笔者选了一则叙述此支由来较为简明全面的墓志来说明：

① 参见《辽史·赵延寿传》及《契丹国志》的相关记载。

② 赵思温，《辽史》本传称“协谋静乱翊圣功臣”，其孙《赵匡禹墓志》（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上）称其为“叶谋静乱翊圣功臣”。

③ 辽代《王仲福墓志》（辽代石刻文续编第8页）即承此说，言“其先出自姬姓，周灵王子王子晋以正谏被黜，时人号为王家子孙，因命氏焉。后升仙于缑岭，今琅玕、太原皆其胤也”。

微子封宋，乐叔居萧，氏族之始也；相国下秦，大夫师汉，门阀之宗也。大齐以肃竹膺期，践皇帝之位；大梁以木刃兴运，张天地之图：传宝祚于一家，易鸿名于两汉。青盖入洛，重南国之衣冠；白马朝周，盛西雍之宾客。公即梁宣皇帝之元孙，明皇帝之曾孙。大父南海王琄，入隋封梁国公。^①

由这则墓志可知，萧氏这一支是非常显赫的，微子、乐叔、萧何（即志中之“相国”）、萧齐的建立者萧道成、萧梁的建立者萧衍等人都赫然在列。

辽代萧氏一族显贵之墓志，多直言出自兰陵萧氏，始祖自然直指微子，远祖则指汉初萧何。在太祖去世后，王郁因为述律后青睐而获得进一步的重用，甚至担任了龙化州的最高长官，他去世后，其子王庭鹑也担任了龙化州的最高长官。其后代为加强这种与后族的联系，将祖先由比干转换成微子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崛起于北方草原的契丹族，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产生了入主中原的念头。为了取得正统地位，契丹统治者在汉族臣僚的策划下，将祖源由炎帝改为黄帝，人为地将古代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都集中在辽阳，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传承表。耶律阿保机以“箕子国继承者”的身份自居，试图标榜自己，使之成为自己作为一方霸主的冠冕，同时也有领土上的企图。耶律德光破晋后，契丹实际上是以殷商的继承人自居，以“会同”、“大同”为年号，改国号为“大辽”。学者们认为辽朝改易国号与其“一国两制”密切相关的见解是正确的，但都没有真正认识原因而强作解人，以致众说纷纭。

[参考文献]

- [1] 姜维东 《耶律阿保机托神改制与黄龙府名称的由来》，《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 4 期。
- [2] 王偶 《东都事略》卷 123《附录·辽国》，丛书集成三编本，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1991 年。
- [3] 钱大昕 《廿二史札记》卷 27《辽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年。
- [4] 景爱 《历史上的萧太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
- [5] 刘浦江 《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 年 6 期。
- [6] 刘凤翥 《从契丹文字的解读谈辽代契丹语中的双国号——兼论“哈喇契丹”》，《东北史研究》，2006 年 2 期。
- [7] 佟家江 《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民族研究》，1983 年 4 期。
- [8] 刘凤翥 《契丹王朝何时何故改称大辽》，《台北历史月刊》，1991 年 1 期。
- [9] 陈学霖 《金宋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年。
- [10] 姜维公 《〈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记事谬误探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 2 期。
- [11] 向南等 《辽代石刻文续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年。
- [12]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 269，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
- [13] 向南 《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责任编辑：刘文山]

^① 《全唐文》卷 229《赠吏部尚书萧公神道碑》。

Keywords: HULV Guang;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regime; political warfar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Liao” State Title

JIANG Wei-gong , JIANG Wei-dong (46)

Abstract: The title as a symbol of the country or dynasty , usually has named distinct and the use of stability. Liao Dynasty does not , it has repeatedly in “Liao” , “Qidan” for the title ,Why will appear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of contrary to common sense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the illustration of the solution. For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scholars usually more to speculation of the solution , the deficiency of slightly due to history books recorded rate can be took , and hard to become a community consensus. The author in the study of the Liao history , geography , found the Qidan once with Jizi orthodox themselves , the change of name ,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rthodoxy of the original. Cover the Liao from Shuomo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eudal dynasty , is bound to for ethnic origin , kingship to undertake reasonable theory , with anaerobic takes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Liao”; “Qidan”; Jizi orthodox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Building up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REN Yuan (59)

Abstract: Social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one of the five major constructions in building up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 but also the driving forc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verall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a new level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four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social construction , which are , the rapid growth of material wealth and the lack of progress in social areas , the expanding diversity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lack of harmonization in social interests , the gradual growth of social forces and shortage of using the social dynamics , the gradual growing of social domain and the shortage of social management support.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 the paper raises four options fo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reform , such as , to enhance welfare for people’s living and realiz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 to coordinate the social interests and complete social integration , improve social function and stimulate social dynamics , to make innovation in social management and improve so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Keywords: social construction; social reform; wellbeing society

Does Education Impact Happiness? A Study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China

ZHAO Xin-yu , FAN Xin (68)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to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public a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made in 2012 in China through a constructive model of educ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 but the impacts are different between absolute and relative incomes , and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is diversified and the transmit variables have different results where education has the obvious positive result transmitted by non-economic factors. Therefore , to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ublic ,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use policy tool to strengthe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to lower the cost of private investment and to make education as the effective channel for public to income promo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mprovement.

Key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education level; years of education; absolute income; relative incom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Criminal Law: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ZHANG Xu (77)

Abstract: Domestic crimi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on the common pace of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which the trend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leg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 it is necessary to view Chinese Criminal Law from the per-